

城市山林与君子栖止

孙丽华

【提要】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之中包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城乡风俗方面的描写。尤其是有关城市生活的表现,堪称生动而细致,具有相当程度的史料价值。而且,这些地方文化及风俗的描写又充分服从于作品所特有的突破文人既有的生存格局、探寻新的人生价值主题之表现,构成了小说艺术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群体中,《儒林外史》在有关地域文化的表现方面是引人瞩目的。

【关键词】城市 山林 城乡差异 栖隐 文人格调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09)05-0124-06

一、具有自由包容度的城市

在小说家吴敬梓笔下,出现了几处名城: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嘉兴和扬州。作为一个比较对象的是,同时期的另一部文人小说《红楼梦》,对于城市生活并没有作多少具体描写。荣、宁二府虽然地处都市,但其门第高峻、玄关紧闭,与周围的环境缺乏交融。大观园更是远离尘俗,俨然世外桃源一般。园中少年人逐日结伴游玩,吟诗赌棋,赏花斗草,直如不食人间烟火的藐姑射仙子一般。对于这样一些人物来说,街市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意象。

吴敬梓应该是一位风俗描写的圣手。在《儒林外史》里,当然不乏乡村生活场景的展现。开篇第一章,我们就领略了王冕的家乡——浙江诸暨地方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绿野中的耕牛、牧童,雨后七泖湖上新荷绽放,都是极具白描功力的引人入胜的景致描写。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这部小说中,美丽的风光通常不会孤独地出现,它们往往都是高士贤人的陪衬景色。诸暨乡村的自然景色当然是隐士王

冕那高洁心地的写照与象征。同时,在吴敬梓的笔下,我们更可以经常看到城市的影像。小说借人物之视野,颇多描写了都市的繁华热闹景象。例如对南京,既描写了聚宝门川流不息地日进千百猪羊万担粮、南门一带车水马龙行人拥挤的热闹景象,也有秦淮河夏日夜晚歌女轻衫顾影、管弦随风悠扬的旖旎风光,写出了文人眼中的秦淮风月繁华之盛。对于当时作为顶级消费性城市的南京独擅的声色胜景,小说家细致描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映像。

或许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这些景色大多是附丽于城市的山林之景。姑且将其称之为“城市山林”。借助小说中那些人物健行的脚步,我们得以见识了诸如南京的清凉山、雨花台、玄武湖,苏杭的虎丘剑池、西湖、邓尉山的景色。应该看到,在描写乡村的时候,作者吴敬梓的笔下没有出现过多的景色描写,其比例明显不及对于城市山林的大量放笔描写。可见他的注意力有特定的范围。这些城市之中或周边的景致,看去如此清丽脱俗、赏心悦目,它们时而开阔宏大,时而

细致如绘，见出作者描写的着力之深、用心之细。表现在这些美好景色之上的，自然是作者以及书中那些贤人高士的恬静胸襟与散旷情怀。例如小说中相当著名的那个段落，性格豪放的杜少卿携妻子一同游赏清凉山，在优美的山林景色中，具有诗人气质的主人公完全陶醉了，他痛饮金樽美酒，挽着夫人的手一路行来，让旁观之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再看庄征君所拥有的玄武湖。那真是一片辽阔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显然这正是吴敬梓心目中理想的隐居地点——城市山林。庄征君住在湖心洲上的大花园里。像这样一个自成格局的幽静园林，四周有湖水作为天然屏障，凡尘俗氛一概被隔绝：“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①不过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却引入了大兵压境的极其不安定因素，让我们意识到这似乎“与人世绝远”，有类于武陵的胜境只是主人的一种自得其乐的幻觉，它毕竟还不是世外桃源。当卢信侯来造访之时，就有中山王府的几百人马凭借湖里的渔船渡过来，火把通明，将庄征君的花园团团围住，来缉拿牵涉禁书要案的卢信侯。又如马二先生眼中的西湖景色，小说采取流动视角，随着人物的行踪，景色也在改换推移，更显出一番全景的壮阔以及动态之美。也许，不是这样恢弘阔大的手笔，就很难表现出西湖一带湖光山色交相掩映的无边美景。当然这些精心的描摹，巧妙选择的视角，归根结底体现了作者对于美丽的自然风景的一派倾倒欣悦之情。

应该说南京是一个奇特的城市。虽然北京也有作为帝王之都的宫殿园林之胜，但是南京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又兼有雄浑壮丽的江山胜景以及幽雅宜人的园林景观，在这一点上，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像这样一个既有都市生活之便捷，又有山林胜景、人文繁盛两相辉映的城市，自然就会吸引像吴敬梓这样的具有隐逸情怀的文人雅士，将它视为自己身心栖止的理想所在。杜少卿只须携带变卖家产的银子，与眷属进入这座城市，随手就可以在自己喜爱的秦淮河边买到住所，与情投意合的朋友朝夕往还，诗酒征逐，展开另一

种全新的人生里程。而作为对比的是困居在恶俗的五河县乡村的虞华轩的苦恼。“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岁上就是个神童。后来经史子集之书，无一样不曾熟读，到了二十多岁，学问成了，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到尾，……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②虞华轩陷身于一片精神的沼泽，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久矣缺少沟通。他一直被众多小人、俗物所包围，心境自然忿郁不舒，处于严重的压抑状态。我们可以理解作者写虞华轩这样一个乡村君子，是有意与走向自由天地的杜少卿两相照应。它隐含的寓意是，如果杜少卿不能毅然舍弃田园宅宅，去到南京这样一个充满自由与文采风流的新天地，就会陷于如同五河乡村那样的宵小横行的恶俗氛围之中，为蕞尔小人所嘲笑，备受心灵上的打击与屈辱。

吴敬梓的小说颇具风土文学特征。作者笔下一般不会虚构故事发生的地点，无论是城市抑或乡村，与《红楼梦》里那些诸如“京师”、“金陵”、“南边”等模糊的地点不同，都是直接采用真实的地域名称。除了前面提到的南京等几大名城之外，小说里也出现了诸多乡村之名。并且我们发现在这部小说中，乡村常常是作为城市的对立意象而出现。我们看到，无论是广东高要县，江苏天长县，^③还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江苏五河县，都聚集着众多宵小之辈。他们惟利是图、不明礼义，言语俚俗，面目可憎。而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读书人与贤达之士常常会沦为被俗恶势力所包围、欺凌的可怜形象，成为一种弱势存在。小说中，作者集中贬斥笔墨所抨击的宵小聚集的五河县就是一个代表。尽管在我们看来此地的贤达之士已经不少，例如余特、余持两兄弟、余家表弟虞华轩等，他们或是德行纯粹或者才学过人，但是由于地方

① 《儒林外史》第35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 《儒林外史》第47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③ 小说中采用的是“南直隶”地名，为了便于把握，在这里仍用常规的“江苏”名称。

上势利之风太浓郁之故，让他们无法显露个性，而一直处于被埋没状态，饱受宵小之辈的讪笑轻视。周围的人们呈现出群体性的颠狂，这些庸俗之人对于官场的权势、盐商的豪富，一味热衷艳羡不已，而对于文化教养与人格操守这些抽象事物毫无兴趣。清贫乐道的文人或者安分守己的乡绅就不免成为世俗之人眼中的笑料、呆子、废物而饱受轻蔑鄙夷。在这样恶俗的环境里，那些想要保持人格尊严的君子只能感到郁闷、孤独，备受压抑，终于不得不出走他乡。乡村意象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不尽然是一派混浊。例如小说中的纯粹君子、一等贤人虞育德出生的江苏常熟县麟绶镇，以及匡超人在他纯真诚朴、力行孝道的早年岁月里所居住的浙江温州府乐清县就被描写成风俗淳朴、人情厚道的乡间乐土。总之，小说中对于城乡风貌的表现，都要服从作者的社会理念表达的需要。这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吴敬梓在他的小说里实际上化用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将城乡这样一组对立的意象作为他的价值评判体系的载体。我们说，事实上乡村、城市的差异也许并不那样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出自作者主观意念上的一种倾向，是一种人为的设置，服从着作者结构理想的人生格局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城乡对立的体系中，无疑，城市由于其宽松、多元的生存空间，是代表着更为丰富、自由的人生选择，以及文化气息浓郁、人文繁盛等积极因素，君子与贤达可以在这里得到更为宽广的精神空间，颐养其人格尊严、振兴礼乐文明；而乡村却显得闭塞、人心卑下、趋炎附势、风气乖戾，充斥着夏总甲、胡屠户、唐三痰一类冥顽不灵的庸俗人物，这里礼义扫地、人伦颓败，成为势利俗风习的大本营，显得一无可取。这种有趣的对比，表现出来的是吴敬梓个人的生活态度以及强烈爱憎。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够否认城市这样一个存在，对于众多想要超越乡村所代表的旧式生活的限制、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那些文人墨客、甚至那些以帮闲、打秋风为业的人们，是

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一种依托或支点。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一席哪怕是清贫狭小的立足之地，如杜少卿那样以卖文为生的文士、沈琼枝那样逃避婚姻诈骗的弱女子；而对于一些并不缺乏胆量的流徙之士来说，他们自然会在城市里发现更多的机遇。例如像匡超人，本来是为了避难而逃奔到杭州，最初想投奔盟兄马二先生，谁知该人已离去，再投奔家乡潘保正所介绍的远亲潘三，其人又适逢外出。不过尽管遭遇并不顺利，匡超人还是很快就谋到生计——自有书坊老板找上门来，请他选批科考文卷；之后当老牌吏役潘三归来以后，更是带挈他参与了一些“有想头”的事情，又是做科考的枪手，又是假造公文，颇赚了一些银子，以至于让他有余裕成家娶妻，过上了像模像样的小日子，这应该是匡超人所始料未及的。又如无所事事、专门蹭饭的季恬逸，因为没有回乡的盘缠而困守南京，只能终日啃几个干烧饼度日，然而一个乡间人物诸葛申的突然出现，为他带来了新的转机，他意识到这个想借刻印科考文卷出名的土财主颇可利用，于是大包大揽地充当经纪人。虽然编选文章的人手尚无着落，但季恬逸并不慌张，他只须向着水西门一路走去，很快就遇到刚进城来的萧金铉，于是一个由出资人、编辑人和帮闲组合的选文班子迅即组成，前一刻还是生活全无着落的季恬逸立刻过上了不愁吃喝的安稳日子。又如清贫的学子武书，逃亡的年轻女子沈琼枝，万里寻父、一路乞讨的郭孝子等人，都在南京这样一个富有包容性的城市里得到了来自正人君子的人情温暖和慷慨资助。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城市为那些拥有文化素养与文字技能而又身无恒产的文人墨客提供了新的生活出路以及精神上的归属。除了做官或者入幕之外，文人们还可以很方便地加入到城市的商业活动之中，以自己的文字能力谋得一席生存之地。比起传统的固守田园或游学游宦的文人生涯，显然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能。城市里充斥着游资、技能劳动者，更具有繁盛的市场需求，很方便策划以及组织商业经营活动。在这种特定的外部条件下，文人由传统的寄身于仕宦或

幕僚、塾师等体现出对于体制的依附性的生存方式转向自由职业者，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就连沈琼枝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年轻女子，也能够在城市里寻觅到一种凭借自己的诗文和绣作技能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尽管她最终还是被遣送回乡，去寻找婚姻归宿，但是毕竟有了南京这样一个风气开放的新天地，使她得以达成一段自立自足的生活。应该说，是南京这样的自由之都，成就了这个心高志大的奇女子的一段豪侠人生。

小说里所出现的纷纭人物，无论是那些君子、贤人，还是犹如过江之鲫一样繁盛的方巾朋友们以及等而下之的张铁臂、洪神仙、牛浦郎之流，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来看，大体上都是处于游走漂移之中。台湾学者乐衡军对此有这样的概括：“每一个角色，从原来散居的地方纷纷流向南京这个中心地。”^①而他们漂移的路线，大致是由乡村、小城镇到中等城市，最后来到作为中心城市的南京。乐衡军也指出，虽然吴敬梓详细地描写了如此众多的大小城镇与乡村，但他似乎有意识地避免对京师作直接地描写。的确，在小说里，那个万城之城、作为“京师”的北京一直就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去处。我们无法从作者的描述中获得对于它的任何具体感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每当某人获得科举功名，将要走进官场，他就会奔赴那个地方。例如周进、范进、荀玫和杜慎卿等人。或许是因为如此，在吴敬梓的笔下，京师北京被认定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漩涡，是腐化怪诞而缺乏活力的所在，甚属乏味。因而作者也不会让他笔下的那些从容淡定、珍惜一己清白之身的君子贤人们前往北京遭受一番荼毒。尤其是庄绍光应征前往京师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这一路上他先是备受惊恐，与萧昊轩结伴同行的时候遭遇响马侵扰；朝堂奏对之时竟必须忍受毒虫啣顶之痛楚；回程路上投宿民家，又目睹年老主人的死丧之变。这些无端承受的消极事件其实都可以作为人物内心对于自己的京师之行感到懊悔的一种意象投射。

二、大隐于朝，中隐于市， 小隐于野

对于中国古代有操守的文人来说，抵御外部环境的干扰、遵循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一个恒久的命题。先秦时期的哲人庄子对于文人的进退出处问题曾经有过一番分析：“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膏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乎网罗机辟之患。”^②庄子的这些思想已经概括了文士对于仕进问题所持有的那种既有所期待又不无顾虑的矛盾心态。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由于他们特定的依附于体制的处境，不免要进入仕途以寻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然而这样一条道路时常又充满坎坷甚至风险不测。当士人感到官场无序而混乱，自己的追求难以实现之时，他们的态度就是退避以自保。其出路就是归隐乡野，杜门远祸。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于这种人生态度的一个简洁概括。到了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科举一途既然完全成为虚诞空花，不足凭借，那么，名贤流辈又将何以栖止？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问题。吴敬梓设想的解决方案是中隐于市。在中国的历史上，隐逸已经是文人的一个悠久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在不断发展、丰富。例如从早期的隐于乡野，又发展为可以隐于市朝。认为君子如果能够心地超然，即使身处官场，也可以保持淡泊悠远的心境。于是相对于传统的归隐田园乡野，又派生出一方新的栖息地朝市。甚至认为能够在这些地方恬然自守，才是真正的隐士。故此，乡野之隐逸被视作“小隐”，而市朝之隐由于其难能，被视为“大隐”。这就是所谓的“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作为一个对于自己的安身立命问题深思熟虑的文化精英，白居易也曾撰诗表达自己的隐逸观念：“大隐入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

^① 乐衡军：《世纪的漂泊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

^② 《庄子·山木》。

作中隐，隐在留司官……”，^①充分表现了文人群体对于隐逸途径的认真思考。他们的结论虽然各有相异，其实陈述的是这样一种看法：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隐逸的方式。吴敬梓正是承袭着这一精神传统，在他自己的生活情境中确定了既不隐于乡野田园，也不隐于朝廷官场，而是遵从自己的心意，既不疏离友朋切磋交往之和悦，也不弃绝山林清幽之意趣，那样就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隐于城市。这个城市自然不是泛泛而指，它必须既有人文之繁盛，亦擅山水之清幽，另一个必备条件是又要远离政治中心，如此则舍南京这样的名城又复何求？与白居易决心栖隐于闲衙冷官，既不趋奉朝市，也不回归乡野一样，吴敬梓也选择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栖隐之地南京。相对于既成格局的大、小隐之途，也可以说这就是吴敬梓的“中隐”了。在小说里，作者还将这一意图一再做直接表白，借小说中一个主要人物杜少卿之口明确说出自己那种远离名利是非、一心陶冶性灵的避居城市山林的意念。例如第三十四回，当朝廷有意征召杜少卿到京师做官的文书到来时，他又是推谢又是装病，用尽心思躲避。妻子很是奇怪，问他为何要如此装乔，杜少卿的回答是：“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里，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②又如第四十四回，表兄余大先生惋惜杜少卿竟撇了大好的祖宅田产，在秦淮河做寓公，对此杜少卿是这样回答的：“我而今在这里，有山川朋友之乐，倒也住惯了。不瞒表兄说，我愚弟也无什么嗜好，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那从前的事，也追悔不来了。”^③杜少卿这些话语固然不乏伤感，然而也满含决绝之意。的确，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有光荣显赫家族史的昔日的贵胄公子而言，告别豪门，转入一种芸芸众生式的贫俭生活，心情应该有许多苦涩惆怅，而且他不但弃绝了祖传的家业，也一并放弃了科举入仕的传统人生走向，未来显得飘摇而不确定。既然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所追求的目标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在杜少卿而言，就是如何保有尊严而自由地生存。相比在天长

县家乡的饱受非议劣评，被界定为败家落魄的不肖子弟，虽然饱食暖衣，无奈精神上的痛苦禁锢何！所以设身处地，我们就不难理解杜少卿弃产离乡、异地漂泊的决绝与无奈了。隐居本来也就是一种逃避，是拒绝自己所不愿接受的一种人生。人生必须有所取舍，而先师早有遗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道是：“君子忧道不忧贫。”^④像杜少卿这样一个人物，在《儒林外史》的人物群像之中，是属于“真儒”系列的，从作者对于人物言行的描述，我们的确也可以认同这一点。如此，放弃财富、功名，安于布衣蔬食的清贫生活，以朋友交往和山林之乐作为自己的生活乐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自尊、有操守的文人如何倾其全力抗拒庸妄流俗袭扰的淡定从容身影。而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回，更是借助一位犹如都市隐士一般的于老者形象，再度提点这一意象。这位老人隐居在城西极幽静的清凉山麓，终日课子灌园，闲暇之时与相知的友人品茗听琴，过着远离世俗征逐的清静生活，诚如他的裁缝朋友荆元的评语：“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哪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活神仙了！”^⑤

固然南京这样的城市也不是君子们理想中的乐土，杜少卿尽管以不顾一切的决绝抛弃家业移居到此，并且诚心期盼能够在此安住优游，然而长安居实属大不易。他只能靠卖文为活，处境甚是艰窘。终于，在虞育德离开南京之后，他也无法继续存住于此，还是追随虞博士而去。可见，杜少卿的漂流正未有终期。他所怀抱的寻觅一个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山林的所在，度过自己所愉悦的散淡生涯的愿望，其实还是缺乏着落的一种梦想罢了。不过，若是从人物的精神追求的角度来剖析，吴敬梓毕竟针对困窘的现实提出了新的人生理想，表达了一种不愿向黯淡乏味的现实妥协的决绝态度。倒塌的泰伯

① 白居易：《中隐》。

② 《儒林外史》第34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③ 《儒林外史》第44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④ 分别见《论语》之《述而》、《卫灵公》篇。

⑤ 《儒林外史》第55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祠固然喻示着老一代文士们所孜孜追求的礼乐弦歌的高雅人生之梦的彻底幻灭，但是在南京的君子贤达之流也终于风流云散之后，作者又顽强地将描写的笔触伸展到里巷街市田畴，在一些并非读书人的市井人物的身上，发掘着淳朴明亮的人文理想。这些平凡人物不骛声华，谦逊自守，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正对应着开篇的品行高洁的乡野君子王冕，固守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尊严的底线。无疑在这样的市井贤人身上，吴敬梓又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寻找到了新的希望与寄托。接下来我们看到作品是如何结局，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当小说中最后一回出场的市井贤人，能诗善画又荡尽万贯家产，沦落到靠开小茶馆勉强谋生的盖宽登临雨花台绝顶之时，

“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地傍着山头下去了”，是的，老一代的人生理想渐行渐远，无处寻觅，终归消歇了。不过，正如当又一个黎明到来之时，一轮鲜艳的红日又将冉冉升起一样，在生命的长河中，人们的精神追求正未有穷期。吴敬梓在将希望寄托向广阔的人间之后，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微茫然而并不渺远的充满内在可能性的暗示。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
系 1996 届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 光

City Life, Gentlemen and Literati's Track

Sun Lihua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novel *Rulin Waishi* included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s of local cultures, city and rural tradition. In addition, these descriptions helped to demonstrate the motif-breaking through the status quo and searching for new objects of life and constituted an organic part of this novel'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Among all the novels in Qing dynasty, *Rulin Waishi* displayed regional cultures especially well.

Key words: city; ruralism;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nd rural life; reclusion; Literati's track

观点选萃

认知文化对农村少数民族诉讼选择的影响

刘 希

云南大学法学院民族法学专业 2007 级博士研究生刘希认为：以往的法学研究更多是以汉族为蓝本进行的研究，没有更多的考虑少数民族在法文化上与汉族的差异性，因此用恒定的标准来套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就会得出偏颇的结论。这也正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的村民法律意识落后，需要加大普法宣传和教育的力度的原因。诉讼是实现法律定纷止争社会功能的正式制度，在我国法律统一的背景下，诉讼制度也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文化间的差异，诉讼制度的作用并不明显。少数民族文化中同样具备定纷止争功能的因素，面对诉讼和本民族文化中的相应因素，人们如何选择、为什么这样选择就成为解读国家法律如何向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运行的重要进路。少数民族的村民们通过自身民族文化中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同样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问题，和诉讼制度达到法律目的上“殊途同归”的社会效果。

(赵俊 摘编)